

浩氣長存

河北革命烈士史料

(一)



浩氣長存

——河北革命烈士史料

(一)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石家庄

浩气长存
——河北革命烈士史料

(一)

(本书原名《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编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59年12月第一版

1978年11月第二版

1978年11月第6次印刷

印数 162,601—222,600

统一书号 11086·7 定价 0.66元

共產主義是不可抗禦的！
聖靈之火可以燒掉原罪！
死難烈士萬歲！

毛澤東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周恩来

你們活在我的記憶中
我們活在你們的事業中

朱德

修订再版前言

河北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许多革命先烈不论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还是在浴血奋战的疆场上；不论是在严刑拷打的法庭上，还是在英勇就义的刑场上，都忘我工作，骁勇善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们的革命精神、光辉的业绩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人民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进行新的长征。为学习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怀着对革命先烈无比崇敬的心情，对原河北省民政厅一九五九年先后编辑的《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二集进行了修订再版。

修订工作得到了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烈士家属和生前战友的大力协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修订再版后，用朱德委员长生前题词《浩气长存》为书题。书中所写烈士大部分是河北省人牺牲于河北或在外地战斗中牺牲，有的烈士是外地人牺牲于河北，或在河北战斗过。文章大多是解放以后撰写的，少数是战争年代所写。还有一部分初版时未收入，这次新编入的。尽管文章体裁不尽一致，内容详略不等，但都比较深刻地刻划了烈士们的英雄形象，真实地记述了烈士们的光荣事迹。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虽然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但这本书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恳请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烈士家属和生前战友、作者及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

我们热切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搜集整理我省革命烈士事迹，使第二、第三集陆续和大家见面。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

一九七八年八月

目 录

- 李大钊同志战斗的一生……………贾芝(1)
- 左权同志的故事……………晋冀鲁豫烈士陵园(18)
- 郭隆真烈士传……………刘清扬(31)
- 董振堂同志传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40)
- 他是军长……………汪洪清(41)
- 烈士韩永禄同志永垂不朽……………罗夫、冯鹏、赵世昌(45)
- 杨春林烈士传略……………张明远(60)
- 张寒晖同志传略……………(63)
- 追悼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同志……………柯仲平(66)
- 七月的风暴……………臧伯平(71)
- 追随着先烈前进……………吾鸣、吉平(100)
- 马本斋同志不死……………华北军区烈士陵园(104)
- 回民之母……………陈静波(113)
- 纪念张岚峰同志……………苏幼民(130)
- 冯化宣同志传略……………马国瑞(134)
- 记节振国烈士……………王 火(136)
- 忠心耿耿为革命……………(147)
- 衷心的告慰……………力 文(148)
- 悼念战斗英雄杨小根同志……………林 呐(153)
- 毛主席光荣的警卫员……………杜鹃程(160)
- 悼念王砚贞同志……………赵幼博(164)
- 悼念贾生保烈士……………臧伯平(168)
- 回忆刘亚生同志……………郭 鹏(177)

张钦烈士事略·····	肖 锋	(198)
党的女儿季洗凡·····	石庄、王兰清	(202)
忆冀鲁豫边区战斗英雄王登安·····	张 涛	(212)
英雄梁振江的故事·····	杨 朔	(217)
永远活着的人——李朝中·····	李晓明	(226)
挺进大别山的英雄——张兆林·····		(234)

李大钊同志战斗的一生

贾 芝

李大钊同志，河北乐亭县大黑坨人。生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牺牲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过，先进的中国人，就象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所描写过的俄国人那样，“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李大钊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勇于寻求革命真理，并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的先驱者。他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积极传播者。他热烈宣扬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并坚决主张中国革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并且参加了创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大钊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在他降生以前，他的父亲李任荣在一次大地震之后不幸病故了；母亲生下他不满一百天，因丈夫的亡故而悲伤致病，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他从小既无父母，也无兄弟姊妹，孤苦伶仃，靠七十来岁的大祖父把他抚养成人。大钊同志幼年上了四年私塾，读的是四书经史。十六岁到永平府（卢龙县）上中学。两年以后，大祖父去世了。大祖父早年曾到关外经商，家中人口少，生活原是比较富裕的；老人死后，大钊同志因是过继来的，受到大祖父的亲生女儿和一个本家叔叔的歧视，大祖父留下的一点财产都被他们挥霍一光。从此，大钊同志就离别了他的故乡。当时，正是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祖国危

在旦夕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推行殖民主义侵略政策，虎视眈眈，妄图瓜分中国；全国各地到处在爆发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大钊同志感到国势垂危，立志愤发图强，寻找一条挽救民族危机的道路。所以，他没有等到在永平府中学毕业，就到天津投考学校去了。

天津当时有三个学校招考：一个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个是北洋军医学校，还有一个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他不喜欢当军医，去为反动军阀服务，所以没有报考军医学校；另外两个学校同时录取了他。但是，在选择前途的时候，他认为入银行专修所学理财只能使个人致富，有违他的素志，于是，他便选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大祖父按照中国早婚的旧习，主持着让他结了婚。祖父死后家境穷了，他在法政专门学校一共上了六年学，都是靠他的妻子在家里典当挪借勉强维持学习的。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大钊同志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当时能诗善文，是学校里的杰出人才之一。然而在他的诗文里很少表现闲情逸致，多是“慷慨思投笔”那样的诗篇和《隐忧篇》、《大哀篇》之类早期的政治论文。他对辛亥革命曾经抱有很大的热情，可是皇帝被赶跑以后，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民国。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一些反动军阀政客，即所谓“骄横豪暴之流”，“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大哀篇》），而老百姓依然处在“刀兵水火，天灾人祸”之中。这使年轻的大钊同志忧心如焚。毕业以后，随着政治知识的增加，大钊同志再建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但感到自己学力依然不足，于是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一九一三年深秋到日本去留学，入了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学习。

在东京留学的三年中，大钊同志学习勤奋，爱读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等人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当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极其关心远东局

势的变化。当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透露了袁世凯和日寇秘密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以后，他满腔怒火，痛恨日本侵略者，痛恨袁世凯这个卖国贼。在他临去日本前不久，有一次他到昌黎碣石山旧地重游，遇到了五个中国路警惨遭日寇杀害，他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蛮不讲理，随意残杀中国士兵，愤慨非常，他说：山盟海誓，不能忘记这个弥天的耻辱。与日寇不共戴天，“有如碣石”。现在窃国大盗袁世凯，竟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卖国求荣，大钊同志的火一般的愤怒是可以想见的。他奔走呼号，联络各省留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通电国内，誓死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罪行。他花了几昼夜的功夫起草了一篇《告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书》，积极进行抗日倒袁活动。他和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来往，成立反袁的秘密团体“神州学会”。除了起草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的宣言以外，他还编了《国耻纪念录》。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气势磅礴、鼓舞人们勇猛前进的《青春》，就是在东京写的。在这篇名文里，他回顾祖国，反复歌颂青春，号召青年们行动起来，冲决旧时代的网罗，打破一切陈腐学说，“进前而勿后顾，背黑暗而向光明”，把古老的旧中国变成“青春的中国”。大钊同志当时所梦想的“青春的中国”自然还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一开始他就显示出他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所要求的是“庶民”的“民主”。

为了进行讨袁运动，一九一五年的旧历腊月，大钊同志从日本回上海。在回国的轮船上，他写了一首诗袁诗。诗里描叙了“一夫终窃国”和“鼓鞞动河北”的情景，抒发了立志献身革命的壮烈情怀：

中霄出江户，明月临幽黑，
鹏鸟将图南，扶摇始疏翼，
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诗末以“男儿尚雄心，机失不可得”结尾。他所歌颂的“雄

心”，就是他在《青春》一文里表现得充沛淋漓的那种冲破一切黑暗网罗的大无畏精神。到了第二年四月间，为了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他干脆中途辍学，甚至不等暑假考试就起程返国了，回到了反袁运动的中心——上海。在那里他只停了两个多月。袁世凯在举国一致的反对下忧愤而死。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却没有灭绝；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大钊同志计划着实现他在日本时和一些朋友谈论过的办报的理想。为此，他又和一位朋友搭船北上，到北京创办了《晨钟报》。

在筹办这个报纸的工作上，大钊同志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他在归国的轮船上就曾把将要出世的报纸命名为“晨钟”；他计划请人设计一个古钟的图案，印在每天的社论前面，每出一期，都在古钟图案上换一句警句。他要敲起警钟来，把人们从迷梦中唤醒。后来，他曾表示过，自己最珍视的是第六号报上的一条警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发刊词里，他提倡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鼓舞人们创造一个“青春的中国”。他说：青年们的字典里没有“难”字，“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大钊同志在《晨钟报》担任总编辑。可是，仅仅工作了三个月，他就自动退出来了。原来众议院的议长政客汤化龙企图把《晨钟报》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由他控制。此人专门网罗袁世凯手下的大小军阀，拼凑班底，搞一些反动勾当。而大钊同志却坚持反对和抨击军阀们的专横暴虐，所以他的文章竟然不能在自己主办的报纸上发表，或要受到汤化龙手下的刀笔吏们的大删大改，为此，他十分愤慨。尽管汤化龙从前也曾经器重过他，但他现在和旧势力只有决裂，决不妥协；他宁肯失业，也决不退让。就这样，大钊同志忍痛辞去了总编辑的职务。

离开《晨钟报》以后，大钊同志没有工作，只好和两三个同学一块住在一位朋友家里，但他仍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和研究问

题。不久，他又到《甲寅日刊》去做编辑。但是，这一次去做报纸的编辑，情况也很不遂意，所碰到的还是他所憎恶的“旧势力”。这时候，正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令人振奋的消息频频传来。反动政府把布尔什维克叫做“过激党”，视若“洪水猛兽”，极力诋毁谩骂。与此相反，大钊同志却密切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发展，经常在报上加以介绍。《甲寅日刊》的老板原也是他的朋友，很赏识他的才华。由于他一再发表反对旧势力的言论，老板颇为不满，托朋友劝他，企图让他改弦易辙，停止革命宣传，可是，坚定果决的大钊同志非但不听这类“劝告”，反而更进一步，公开在报刊上介绍起“过激党”来了。这使得老板对他更加不满了。不久，张勋复辟事变发生，《甲寅日刊》的老板跑了，大钊同志也匆匆南下，于是又结束了他第二次办报的生活。这一次办报，仍然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三个月内，大钊同志在《甲寅日刊》上先后发表了六十来篇文章，一位追求真理、反对黑暗统治的英勇斗士的形象，已然出现在读者面前。

十月革命的火炬照亮了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前进道路。大钊同志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发出热烈的欢呼。大钊同志于一九一八年二月被北京大学聘为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在地的“红楼”从此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革命策源地。在这个时期，大钊同志进一步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苏联革命经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在首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结局和苏联革命的成功作了正确的估计。他指出，许多人“发狂祝贺”“公理战胜强权”是“强颜取媚”，“拿人家的光荣当自己的光荣”；连不出一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也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因为“大战”的告终不是“双方哪一边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资本家的政府

防遏不住的“新潮流的胜利”。帝国主义强盗们不过是一丘之貉。这个胜利“不是威尔逊的功业”，而是“列宁的功业、马克思的功业”。他说，这是人类的“新纪元”；“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且他宣称：“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是可以阻碍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拉摧他们。”如果如大钊同志在他的三年前的第一篇名文《青春》里所说的“青春的中国”还只能是一个模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那么现在他的心目中所要创建的，就是一个属于新世界的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他以挽救民族危机、创造“自由的乡土”的热忱，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他看到了苏联革命的胜利之后，他的心情正象他自己所描写的：

“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新纪元》）

从苏联十月革命射过来的这一线曙光，在我国变成了点燃人们的革命热情的熊熊火炬。大钊同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新青年》本是鼓吹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引导青年们追求新思想的号角，这时已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大钊同志指出了中国的新出路，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月，他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我国第一篇向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以及女高师、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等几个大学教课，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现代政治》、

《女权运动史》等课程。他在当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名教授之一。他一方面利用课堂和各种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新文化运动，同时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全国各地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反映新思潮的刊物。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等刊物，都与大钊同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给许多刊物写稿，参与和指导一些爱国团体的活动。《新青年》的姐妹刊物《每周评论》，也是他亲手创办的。在出版“创刊号”时（一九一八年冬），大钊同志深夜和编辑部的一个同志一起到工厂去校对清样，直到天快亮了才回家，他们一路上兴奋得很。《每周评论》连续刊登了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文章。

大钊同志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这个团体最初是想在知识界团结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向着革命方向走的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组织。尽管当时大家所理想的“少年中国”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正如大钊同志说的：

“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

大钊同志为了创造一个“青春的中国”或“少年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认为“要把现代文明从根底里输入到社会里面去，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他号召青年们“到民间去”。“少年中国”后来分裂了，有不少会员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有的后来变成反共反人民的无耻政客，并且在反动军阀杀害大钊同志时参与阴谋活动，象李璜、曾琦之流。

在创办《每周评论》之前不久，大钊同志又参加了他曾经忍痛离开的“晨钟报社”。《晨钟报》于一九一八年九月被段琪瑞军